

第四章

第二次赴苏学习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

一九二七年七月初的武汉，正处在暴风雨到来的前夜。这里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一度是革命的中心。江岸码头上，大街两旁，高大建筑物上，到处可见革命的标语。街上不时地走过群众的游行队伍，那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欢呼北伐军出征河南打败张作霖所取得的胜利或号召东征讨伐蒋介石的背叛罪行。然而，和武汉闷热的天气一样，我们已经感到了事变到东前的沉闷。郑州会议以后，宁汉合流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这期间，我从宜昌往返几次来武汉，向党组织请示汇报工作。汪精卫一天天走向反动，形势一天天的紧张。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发表声明“分共”，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大批从国民革命军中退出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云集武汉，等待着党采取果断的行动，扭转形势。革命处在危

急的关头。

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从宜昌出来，一路上反复思考的问题是，大好的革命形势为什么会半途而废？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会有这般结局？今后怎么办？在汉口李富春同志的家里，我见到了方维夏、李六如同志，他们也都先后离开了国民革命军。我们这些在北伐中并肩南北征战的战友，在一起交谈着，百感交集。虽然那时我们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认识还不深刻，但我们的同感是，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是我党的一大失策。我们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了将近两年，应该说对旧军阀部队的改造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就拿我所在的六师来说，已有三分之二的力量基本上是在我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之下。如果党的路线正确，完全可以逐渐地把这支军队掌握在我们手里，至少在国民党叛变时，可以多拉出一些队伍，使之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可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对我们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做了种种限制。不准共产党员当军事指挥官，不准在部队内发展共产党员，特别是在蒋汪叛变时，对形势没有正确的估计，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使我党失去了掌握这支武装力量的大好时机。一旦蒋汪叛变，即束手无策，只好听凭国民党反动派绞杀革命，这是一个多么惨痛的教训。当时，我们这些从国民革命军中撤出的同志很着急，蒋汪叛变后，把我党置于非法的地位，城市中已不能公开活动，今后的革命怎么搞？心中没

有底。同志们聚在一起就谈这些问题，找领导时也打听这方面的情况。这一段时间，我住在李富春同志家里。富春同志来往于军委周恩来、聂荣臻等同志那里，工作很忙。从富春同志那里我得知党已经停止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成立了临时中央，正在采取挽救革命的措施。富春同志告诉我，党决定将自己掌握的一部分部队组织军事暴动，武装反抗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要我做好准备奔赴南昌参加武装暴动。

在武汉的短暂停留，却使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变化。这里要提到我党的一位忠诚朋友——朱剑凡先生。朱剑凡先生是湖南的一位很有名望的教育家。他出身于封建士大夫的家庭。早在“五四”以前，他就怀着教育救国的强烈愿望，冲破封建势力的禁锢和封锁，毁家兴学，创办了长沙第一所女校——周南女校。他致力于传播新文化，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教育，提倡男女平等，宣传妇女解放，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女革命家。周南女校成为湖南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向警予、蔡畅等同志都曾在这里读书，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五四”前后，我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就知道剑凡先生的名字，他与徐特立、何叔衡、方维夏、董维健等，都是湖南著名的教育家。他们致力于改进教育，启发广大人民的觉悟，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的言词和主张，在我们这些刚刚开始革命活动的学生中间是很有影响的。后来，剑凡先生在革

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接受马列主义，积极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一九二五年秋，我离开安源路矿工会来到广州，剑凡先生也在广州，他是代表湘军参加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并在富春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训练班任教育干事，负责日常教育行政工作，兼讲授帝国主义侵华史。因富春同志任第二军党代表，我任该军第六师党代表，这样，我就认识了剑凡先生，我们见过面，聆听过他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解。北伐战争开始后，我奔赴赣浙前线，剑凡先生返回长沙，他按照我党的指示，与徐特立、张唯一、熊瑾珩等同志组成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并任常委，他还兼任了长沙市政筹备处主任和公安局长等职。对长沙的土豪劣绅的反扑进行了镇压，对国民党的右派组织进行了打击。所以，在“马日事变”时，他受到许克祥的通缉，处境十分危险。我党为了保护他脱离险境，派人从武汉到长沙，以唐生智部队的名义，将朱剑凡先生的一家，从长沙接到武汉。我率六师部队北伐从安徽返回武汉时，又一次与他重逢。在大革命开始转入低潮的时候，剑凡先生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他不仅自己参加了革命，而且把他所有的子女都带到了革命队伍中来。这次我回到武汉，恰巧剑凡先生一家也住在李富春同志家里，来往更加密切了。剑凡先生对我的印象不错，又经蔡畅同志从中作媒，我与剑凡先生的女儿朱仲止同志结婚了。

婚后不久，武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汪精卫对我们共产党人已有剑拔弩张之势，我党同志在党的安排下纷纷撤离武汉，大部分同志奔赴南昌前线。就在这时，党组织改变了让我去南昌的决定，通知我去苏联学习。大约在七月底，汪精卫开始大屠杀之前，我离开武汉，只身来到上海，等待出国。

此时的上海，已是一片白色恐怖。江边码头上，到处都是武装的印度巡捕，上海人叫他们“红头阿三”，街上便衣特务、暗探很多，党组织已完全转入地下。我住在一家旅馆里，只与交通员一人联系。大约在九月初，我拿到了去海参威的船票。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在一天夜里，我化妆从上海吴淞口上了一条小舢板，划到江心泊着的商船边，爬上去后下到底层的货舱，开始了二次赴苏的航程。这次离开祖国，心情十分复杂，面对大革命的失败，内心很痛苦，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心里也不够明确。但是，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坚信不移的，抛弃了新建立的小家庭，抛弃了自己个人的一切，毅然决然地奔赴苏联去学习苏联革命的经验，用革命的知识充实自己回来继续革命。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是十分生动地描写了我们共产党人当时对待革命失败的态度。

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

沿着第一次去苏联的路线，我又一次来到了十月革命的故乡，旧地重游，感到十分亲切。按照党的安排，我直接来到列宁格勒，进了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

列宁格勒在十月革命前叫彼得堡，过去是沙皇的统治中心，又是十月革命的发祥地，富丽的冬宫使我们赞叹不已，它不仅是俄国文化的象征，还记载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辉煌业绩。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座落在尼罗河畔，它是用在保卫列宁格勒战斗中英勇牺牲的苏联红军政治委员H·T·托尔马乔夫的名字命名的。这是一所培养高级军政指挥人员的正规学校。苏联的许多高级将领毕业于这所学院。记得在这前后，苏联的著名将领铁木辛哥、朱可夫都在学院的高级指挥班学习过。进入到这所学院学习我非常高兴。早在第一次来苏联学习时，我就对军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苏联的初级军官学校学习了一年，由于陈独秀的反对，没能完成学业。这次能够如愿以偿，心皇当然高兴。特别是有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有了不重视军事工作的切肤之痛，我们这些被派来学军事的同志，都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

我们在军政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共有十多个人，能得起名字的有刘明先、刘伯坚、李卓然、傅钟、曾涌泉、

李特、朱务善、伍止戈、蒋经国，还有一个高×，名字忘记了。我们中间少数是从国内来的，大多数都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转来的。同班同学中现在活着的只剩五个人了，李卓然、傅钟、曾涌泉和我，还有一个是在台湾的蒋经国，蒋经国也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转到列宁格勒军政学院的。他来的时候是个共青团员，后来在我们支部入的党。我们单独编成一个班，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开始我担任支部书记，后来是刘明先同志。

军政学院学习的内容，军事课占40%，政治课占60%。军事理论学习有战术学、战役学、指挥学等等。这时苏联红军的军事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战略战术原则。既有正规战的战略战术，也有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我们都从理论上进行了学习。正规战、阵地战学的多一些，游击战也学了，但比重较小。结合学习，我们经常进行一些战例解剖，进行沙盘作业，做想定作业。进行比较正规的战术、战役和战斗演习，从进攻到防御，从全局到局部，从战略决策到具体的战斗动作，都进行了较系统的学习。还学习各种战斗条令、条例。政治学习侧重于军队的政治工作，如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委员条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工作方法等等。还学习一些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理论课，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些著作。这时，我们的俄文水平都达到了比较高的程度，上课不用翻译，直接听苏联教员的讲课，用俄文作笔记。学

习期间，斯大林来学院给我们作过报告。我们还听过当时的骑兵军军长、后来的苏军元帅布琼尼的报告。教员中还有一个叫图哈切夫斯基的，后来也当过苏军的元帅。

在校期间，我们中国学员享受苏联红军营一级的军官待遇，除了吃饭以外，只有很少一点零花钱。但我们感到十分满足。苏联当时还处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刚刚起步期间，国力并不很强，人民也并不富裕，他们以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在我党处于极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节衣缩食支援中国革命，为我们创造了优越的学习条件，我们从心里感激苏联党和苏联人民。这次到苏联，在我思想上有两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是与我第一次到苏联时的苏联国内情况的对比，给我印象十分深刻。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仅仅用了三、五年的时间，就已经摆脱了贫困，战胜了战后的各种困难，迅速医治好战争的创伤，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这使我坚信，尽管我们国家很贫穷落后，只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共产党掌握政权，同样可以改变祖国的面貌，繁荣富强起来。另一个是北伐战争的失败与苏联红军的胜利的对比，使我清楚地看到，我们党不掌握兵权，没有自己的军队不行。所以我在学习中对军事最感兴趣，最喜欢上军事课，下的功夫也最大。在校期间，我和李卓然等几个要好的同学，还比较爱好运动，业余时间喜欢打打球、滑滑冰，夏天还喜欢去游泳，相处得

很好。

一九二八年夏天，党的“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六大”结束以后，新当选的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来到列宁格勒看望我们在军政学院学习的同志们。我们召集了党员会议，向忠发向我们介绍了国内的情况，并传达了党的“六大”的主要精神。我记得一是讲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国内蒋汪反动，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在我们党内，“八七”会议以后又出现了瞿秋白同志的“左”倾盲动主义，这次党的会议停止了这一错误。二是讲了这次会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确认中国革命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目前处于高潮与低潮之间。要准备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并告诉我们党确定了武装起义，建立红军的方针，确立了军事工作的重要地位，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回国后参加军事斗争。三是讲了阶级路线问题，给我印象很深。“六大”强调了工人阶级的作用，特别提出了指导机关的工人阶级化问题，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了否定。也就是很据这一原则，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实际上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都不高，后来叛变了革命。我记得这一阶段，在党内强调了凡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人都不发展入党。这是党的“六大”的缺点之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来仲止同志也来到苏联，开始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英语系学习，后来转到莫斯科共产主义

劳动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夏天，朱仲止到列宁格勒来看我，向我谈了王明在莫斯科搞小宗派，反“托派”的情况，并且告诉我，这场斗争的打击面很宽，她也遭到了打击，说她的出身不好，被开除出党。朱仲止同志对我说，她已提出了申诉，但没有结果。我当时对莫斯科那里发生的事情没有更多的了解，也只能是一般地安慰她一番。我们列宁格勒这个班的同学，都比较团结，大家一心一意地学习，党内生活也很正常，没有受王明他们搞的那一套的影响。

我在苏联学习了三年，一九三〇年夏天毕业，我们开始分期分批回国。朱仲止、周砥和我三人一起离开苏联。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刚一岁半，年纪太小无法带回国，只好寄养在莫斯科保育院里。一九五〇年我去苏联时，曾批过这个孩子，但由于时间太久，又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乱，已经无法找到了。离开苏联时，我化妆成汽车司机，经西伯利亚到海参威，乘船返回上海，住在朱剑凡先生家里。那时朱剑凡先生已是病魔缠身，身体很不好，但仍积极参加宋庆龄、鲁迅、蔡元培发起的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筹建工作。当时他献身革命事业的意志很坚决，准备病愈后奔赴苏区。他找病学习马列主义和党内刊物，请李维汉同志向党组织转达他的入党要求。他把全家老小组成一个战斗集体，从事革命工作。他的居所门面是一个小酒店，实际上成为我党负责同志的秘密碰头地点和

休息场所。那时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特务如麻，我们党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都出生入死的工作，处境十分危险。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蔡畅、聂荣臻、何叔衡、谢觉哉等同志经常来这里，摆上一桌麻将做掩护，在一起商谈工作。我到上海后不久，党组织就派我去湘赣苏区工作。我到了湖南，指定的接头人是那个曾经在安源工入俱乐部工作过的宁迪卿。然而，这时湖南的地下党遭到了破坏，宁迪卿也叛变了。我没能接上关系，处境又很危险，只好又返回上海。接着，组织上又派我去闽而苏区。这样，我就和李卓然同志一起离开上海，转遭香港，奔赴中央很据地。